

20世纪

中国纪实文学文库

1976-1999

瞬间与永恒

第四辑

人物卷

主 编 / 柯 灵

执行主编 / 关 鸿

本辑主编 / 桂国强

 文 匯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戎思平 杨建英
封面装帧：陶雪华

20 世纪中国纪实文学文库

第四辑(1976—1999)

瞬间与永恒

人物卷

主编 柯 灵

执行主编 肖关鸿 本辑主编 桂国强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竞成印刷厂印刷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90000

印数:1—10000 印张:17

ISBN7-80531-585-X/I·75

定价:26.00 元

前 言

纪实文学是一个民族为自己建造的纪念碑。它真实地记录了民族的盛衰强弱荣辱兴亡。墨写的史册比任何花岗岩建筑更加永久而辉煌。

纪实文学的传统源远流长,几乎与文明史一样悠久,早在公元前前后后两个世纪,东西方相继出现如《史记》与《希腊罗马名人传》这样的皇皇巨著。

但是,古典纪实文学中的一种主要样式传记文学的黄金时代并没有持续多久,长期的停滞一直到明清之交才出现转机。

本世纪初,纪实文学的另一种主要样式报告文学应运而生,这不仅出于急剧变化的时代的需要,而且还与近代新闻事业和机器印刷术的发展密不可分。

传记文学的复苏,报告文学的新生,中西文化交汇的激流注入的生命力,使纪实文学呈现了全新的面貌和空前的繁荣。

现代纪实文学的兴盛是历史的选择。它与20世纪中国的命运息息相连。纪实文学第一次成为时代最敏感的神经,同样,时代也为纪实文学提供了最广阔的天地。

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这个世纪对当代人与后继者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世纪末又将临近时,人们已

经开始了从各个领域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对这个将要结束的一百年进行回顾总结。这是一个太大的题目,我们只能从某一个方面做点自己的努力。

我们选择纪实文学,首先因为还没有人做过这样的梳理和总结,这样的尝试富有某种挑战性。

另外,纪实文学既是历史的,又是文学的,是文学作品中最为贴近历史贴近现实的一种样式。我们梳理纪实文学的脉络,也是梳理历史与现实的脉络。这会成为我们作世纪回眸的一种方式。

自从历史的概念被分为“事件的历史”和“叙述的历史”之后,人们意识到很大部分历史都是“叙述的历史”。因此,不是官方教科书,而是由亲历者根据个人经验撰写的“历史”就显得特别珍贵。这也是纪实文学的价值所在。

纪实文学留给当前的是信息,传之后世的是文献,而信息传播与文献留存的载体则是有欣赏价值的文学。我们在兼顾到这三种价值的同时偏重的是文献价值,旨在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直接观察和原始文献。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选编的纪实文学范围除了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这两大类之外,还有纪实性散文和文学性特写。

整个20世纪纪实文学拟选编为五辑二十卷,从1996年起逐年推出,到1999年完成。这是一个颇为浩大的工程。

今年年初先推出第四辑六卷。年底将推出最后第五辑四卷。

编 者

目 录

前言·····	(1)
我爱我的父亲·····	邓 林(1)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29)
几番风雨忆周扬·····	龚育之(63)
荣毅仁先生·····	建 华(103)
照澜院里钱伟长 ·····	常 青、王宗仁(113)
十年风雨情·····	章含之(126)
王光美：一位母亲与一千万母亲 ·····	支东升(149)
雪山之子 ·····	邢军纪、刘福波(160)
船长·····	柯 岩(209)
大雁情·····	黄宗英(235)
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 ·····	萧 乾(263)
生命从八十岁开始·····	周 明(280)
我的爸爸曹禺·····	万 方(293)
历史学家黎澍的品格·····	丁守和(307)
遥寄张爱玲·····	柯 灵(331)
绝唱·····	陈 钢(341)

我的路.....	刘晓庆(351)
哥德巴赫猜想.....	徐 迟(395)
难忘的回忆.....	华罗庚(421)
父亲和我.....	杨振宁(429)
李政道与中国.....	顾迈南(441)
丁肇中的科学之路.....	桂 峰(451)
她有多少孩子.....	理 由(464)
物理科学第一夫人吴健雄.....	江才健(484)
船王包玉刚.....	铁竹伟(494)
编后.....	(538)

邓 林

我爱我的父亲

1997年2月19日——爸爸走了，那么从容、平静、安详。

他是含着微笑远去了……

这一年，爸爸九十三岁。

日转星移，岁月如梭。

每当我走进我们家的院子，不禁思绪万千。算起来，爸爸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二十年。爸爸是非常钟爱我们家的这个院子的。他每天都要在院子里散步。这里的每一棵花、草、树木都已经成为他的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跟随着他的脚步，一天天长大，一年年成熟。当年那几棵石榴树，如今已高过房顶。到了秋天，果实累累，压弯了枝头，火红的石榴绽开裂口，露出一颗颗石榴籽，红白相间，像宝石般晶莹剔透。核桃、柿子、海棠、葡萄熟了的时候，引得小鸟、鸽子、灰喜鹊常来光顾。三棵雪松已经长得遮天蔽日。还有几棵白皮松英姿华贵，伸向蓝天。那两棵油松，长得拙朴、苍健。一棵高，另一棵稍矮，枝叶互相拥抱着，并肩站立，好像是我们的爸爸和妈妈相依相伴。我们就给它们起了个名字叫“双龙树”，因为我们的爸爸、妈妈都属大龙。到了隆冬时节，万木已经凋零，我家院子里却还是绿色常新，松青依旧。

如今，每一天，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仿佛依然能听见爸爸在院子里散步的脚步声；走过他的办公室，我好像又看见爸爸还坐在

他那张套着土黄色布套的旧沙发上，静静地读报，专心地批阅文件；我似乎还听见，孙子们在爸爸的身旁叽叽喳喳，欢声笑语……家里一切都显得平静如常，好像爸爸并不曾远行。

每一天，当我走在大街上，看见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人们匆忙的脚步、街市日新月异的面貌，显示着活力和勃勃生机。正如爸爸生前所期望的那样，人民在满怀希望地辛勤工作，我们的祖国正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前进。

而在我心里，总是觉得爸爸并没有走，他和我们在一起，他还生活在我们中间，慈爱地、带着欣慰的神情在注视着我们。

我想念我的父亲，这种思念之情与日俱增。

—

我是家中的长女，1941年9月11日出生在太行山。

我的降生，本应会得到父母加倍的疼爱。可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正在对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根据地进入了最艰苦的境地。军情紧急，爸爸无法带着我率兵打仗，刚刚出生七天的我，就被托付给一个非常贫苦的农民家抚养。两年以后，当我被接回到父母身边，已经奄奄一息，极度的营养不良，多种不知名目的疾病，使我衰弱得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了。父母心疼之至，却不得不把我又送进了延安保育院，因为爸爸还在打仗。我身体太弱，常常不能和其他的孩子一同到外面去玩耍。一天，刚刚两岁的我被独自留在房间里，突然，我的棉袄袖子被炭火烤着了，我拼命大哭。终于被一个小战士听到，救了我，否则我可能就被烧死了。直到现在，我的胳膊上还有一个很大的烧伤的疤痕。妈妈常常对人说：“邓林小时候真是受了不少的苦。”

爸爸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很少用语言表达感情。解放战争胜利后，从上海到四川，再到北京，爸爸千方百计为我寻医治病。我的病

情比较复杂,特别是嘴里长了瘤子,开过刀,又长出新的瘤。爸爸下了大决心,费了许多周折,使我得到当时那种条件下最好的治疗。此后,我的体质虽然仍不能和我的同龄人相比,但我却也能以基本正常的体魄面对生活,建立家庭,承担责任,做出成绩。我知道,这一切是爸爸、妈妈给予我的。

全国解放后不久,爸爸调到中央工作,我们家搬进了中南海。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五个姊妹兄弟。爸爸、妈妈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对我们从不娇惯。小学,我们三个大孩子上寄宿学校,每星期自己坐公共汽车往返于远郊区的学校和中南海的家。上中学大家都骑自行车。爸爸每学期期末都要看我们的记分册,每个孩子的情况他都了解,优点、缺点、性格特长,他心中有数。但是具体的事情,他一概不管,放手让妈妈教育我们。爸爸信任妈妈,相信她带出来的孩子都是好的。他们两个,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非常和谐、默契。所以,我们家的孩子都比较正直,善良,质朴无华,也都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妈妈曾经说过:“你们五个都已成才,都有自己的谋生手段,你们在工作岗位上都能够兢兢业业,力所能及做出成绩来,妈妈高兴,爸爸也高兴!”我们可以自慰,我们没有让爸爸、妈妈失望。

我的妈妈是云南省历史上第一个考入北京大学的学生。投身抗日,到了延安,1938年和爸爸结婚。妈妈是个好人,朴实,诚恳,大方,与爸爸相濡以沫、共苦同甘。妈妈心地善良,为人又厚道,又宽容,而且特别能干。想当年,我们家五个孩子的毛衣、毛裤等,都是妈妈一手织成的,织得又快又好。“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的时候,妈妈为爸爸精心织补了一件开司米的毛衣。袖子上原来破了一个大窟窿,被妈妈修补过后,完好如初。

爸爸、妈妈希望我们都能成为有知识、有文化、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小时候,每个星期天,妈妈都会为我们安排一些有趣的活动,

参观啦、郊游啦、看电影啦……妈妈带我们一起浇花、种菜，教我们女孩子打毛衣，培养我们的劳动观点和生活自理能力。爸爸喜欢打桥牌，妈妈就自己先找人请教，她学会了以后再教我们。我们五个姊妹兄弟都学打桥牌，只是大胖子朴方和楠楠打得最好，多年来一直是爸爸的好搭档。妈妈自己也经常给我们讲科学知识。关于核裂变的原理，就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听妈妈讲的。我的弟弟、妹妹有三个考进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大概也是受了妈妈的影响。

我的身体多病，学习有些困难，曾几度休学。妈妈鼓励我说：“要发愤图强。”爸爸说：“不是发‘愤’，你不是跟谁生气。你应该奋发图强，自己振奋起来，争取好的成绩。”爸爸的话给了我信心和力量，成为我多年来争取进步与成功的动力。妈妈为了我的学业费了许多心思，最后给我请了一位中国画老师，让我学习画中国画，既能适应我的身体条件，又能充分发挥我的特长。今天我能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成为一个画家，我十分感谢妈妈为我所作的选择和安排。

现在想起来，我们的青少年时代是多么幸福、美好！我们无忧无虑，我们快快乐乐，我们学习都非常努力。几个弟弟、妹妹在学校都是优秀学生，还当学生干部。回到家里，我们感到温暖，充实。说句实话，那时候，对于父亲的了解真是太少，太少。他的职位有多高，他的权力有多大，我们都不大清楚，也不太关心。只知道爸爸是党的干部，为党工作是他的天职。因此我们必须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我们都爱我们的父亲，我们都爱我们这个家。

但是后来，我们没有家了。那个疯狂的年月打碎了一切。

1966年6月，一场风暴无情地摧残着整个中国大地，一切尊严、秩序都被扫荡殆尽。法律、信念、道德、感情被撕扯得支离破碎。正直的，无所适从；疯狂的，随心所欲。中国正在向何处走去？！

当时，我的父亲还正在他自己的岗位上。他曾期望能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阻挡那些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但是没过多久，我的爸爸被宣布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求“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爸爸被彻底打倒了。

我们的爸爸，那个曾经出生入死、驰骋疆场、屡建战功的爸爸；那个兢兢业业、日理万机、受人尊敬的爸爸——他和我们的妈妈并排站在院子中间，被人群围着。人们吼叫着，挥舞着拳头，凶狠地强迫爸爸、妈妈低头、弯腰……我们几个孩子被惊呆了，心里害怕极了！

我回到学校。学校早已经没有课上了。到处口号声震天，大字报铺天盖地。熟悉的面孔突然变得冷若冰霜。呵斥、批斗、谩骂、吐口水……我觉得我们全家像是被一阵恶风浊浪抛向了无底的深渊，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明天将会怎样……

“好心人”跑来劝我说：“赶快和你爸爸划清界限，揭发他的问题吧！”我哭了。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爸爸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我更不明白，我和我年幼的弟弟、妹妹们究竟做错了什么？

运动刚刚开始不久，我曾经问过爸爸：“我们该怎么办？”

爸爸回答说：“你们自己考虑。”

命运逼迫我们去了解父亲，认识父亲。我们必须独立思考，不能有任何依赖、幻想。

我和两个妹妹骑上自行车，跑到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机关去看大字报，想看看爸爸到底有什么问题。结果只看到“白猫黑猫”等几条所谓的“罪状”。

爸爸没有问题。我们自己这样认为。

但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还容不得想，我们全家就陷入了越加艰难的境地。

爸爸和妈妈失去了自由。全家人都不能、也不敢和他们说话，如果被人听到，说我们通风报信，说我们串供，他们的处境就更难了。

美术学院宣布不许我回家，还要我参加批斗大会，揭发、批判我的爸爸。我因为内分泌失调，多年来患有嗜睡症。有一次开批判会，会场上高喊着“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可我居然睡着了。事后，我因此而遭受批判。

朴方和楠楠在北京大学遭受围攻、逼供。他们说朴方是“小邓小平”，对他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取消他的预备党员资格……最终酿成终身残疾的悲剧。这是我们全家最伤心的事。妈妈为此哭伤了眼睛。

爸爸被打倒之后，我被关进“牛棚”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敢理我，也不许我回家。我天天想家。不知道爸爸、妈妈、奶奶怎么样了？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看见他们了。有一天，我请假上街去买日用品。出了美术学院的大门，我突然想到家，我要回家去看看爸爸，见见我的亲人们。心里这样想，脚底下走得飞快，直向着中南海里那个我日夜思念的家。

我从后院的小门溜进了家。爸爸、妈妈、奶奶都在，弟弟、妹妹们都不在。爸爸沉默，妈妈显得疲惫，有些憔悴，奶奶还是老样子。看见我回来，他们露出了笑容。我心里非常激动。我已经记不得当时我都说了什么，听了什么。或许就是我谈谈我的情况，听听他们的情况，弟弟、妹妹们的情况……这在当时对于我们是多么重要、多么珍贵、多么迫切想要知道的消息！然而，对于我，更重要的，是我的胜利。我回到了家，见到了我的爸爸、妈妈。这是我第一次在逆境之中经过斗争，运用自己的智慧，争取到的应得的权利。

挫折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其中一大收获就是学会了搬家，

打包，捆行李。在那动荡年代里，我们被到处驱赶。子女的聚、散、归、离暂且不算，就是以爸爸、妈妈为中心的我们的大家，十年之间，一共搬过七次。除去江西那三年，我们几乎每年都得搬一二次家。

1967年9月，我还关在美术学院里。一天，突然通知我赶快回家。回去一看才知道：限令我们五个孩子和奶奶两个小时搬出中南海。两个小时！天哪！那可是那么大一个家呀！不容迟疑，不许争辩，不能抗拒。我们闭着嘴，用最快的速度把可以带走的生活必需品打包，装车，离开了中南海。

爸爸和妈妈被留在中南海，单独隔离起来。

分离的时刻，我们不能叫一声爸爸、妈妈，不能和他们说一句话。看着爸爸、妈妈凄凉、无助的身影，心里难过极了！我有多少话想对他们说，哪怕只说一声：“爸爸、妈妈多多保重！”可我什么都不能说，连哭都不能哭。我强忍着不让泪水掉下，扭过身去，不敢再看那别离的场面。

我们五个子女和奶奶一起，被送到方壶斋的两间小屋暂住。没有爸爸、妈妈在，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没有家了。

1969年，我已经随美术学院的同学一起被送到河北宣化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我在那里当过造纸厂的粗筛工，当过酱油厂的洗刷工。更多的时间我是和大家一起“修理地球”，翻地、种水稻、挠秧、拔草，什么活都干。

10月，林彪一号通令下达。连里突然通知我马上回北京去。

“找谁去呀？”我问。他们也说不清。

“你就找中办去吧！”连长说。

归心似箭。我下了火车，直奔中南海。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不知出了什么事情。西门的警卫说：“回家去吧！”我三步并作两步地跑。推门一看，几个月不见，爸爸、妈妈和奶奶显得苍老了许多。

多。难以想象，那被监禁的日日夜夜，他们是怎么度过的？更让我难过的是，爸爸、妈妈和奶奶马上就要被押送到江西监督劳动，两天之内动身。叫我回来是让我帮他们打行李。那时候，毛毛和飞飞早已分别下到陕西、山西的农村插队；朴方正躺在医院里；楠楠也已经跟随北京大学的学生去陕西汉中劳动。他们都不可能回来。只有我独自面对这三位即将远行的年迈的亲人。

我哭了。妈妈和奶奶都哭了。

爸爸依旧沉默着。

10月22日，一个难忘的日子。我陪着三位老人坐在一辆吉普车上。汽车呼啸着驶出了中南海。天空阴沉沉的，路程好像很远，很远，走了很长的时间，才到了一个远郊的机场。

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我们都不想说话。因为我们都无话可说。

又要分手了。生离死别！伤痛和凄凉压满我的胸膛。

飞机消失在灰蒙蒙的天空中，不知道我们未来的命运将会怎样？

江西是个美丽的地方。青山常绿，碧水长流。

江西对我父亲来说，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地方。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两次最痛苦的磨难都是在江西度过的。第一次是在1933年。当时，毛泽东遭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斥。爸爸因为支持毛泽东的路线，被撤销了职务，受到党内处分，强迫劳动。他的家庭又在此时发生了离异。沉重的打击改变了爸爸的性格。他从一个开朗、活泼、谈笑风生的青年，变成一个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却又是刚毅果断、坚韧不拔的人。那一年，爸爸二十九岁。

三十六年过去，爸爸已经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了。再进江西，是第二次被打倒，专机押送，监督劳动，一住就是三年多。上午爸爸、

妈妈步行去工厂做工，下午读书、学习，和奶奶一起劈柴、拖地、喂鸡、做饭、洗衣……繁忙辛苦。不许和人交谈，不许与人交往，不许走出院门。三位老人相依为命，孤独冷清。我想，爸爸的内心是很痛苦的。国家的前途不可知，事态的发展不可知，个人的命运不可知。他在苦苦地思索，静静地等待。我知道，爸爸是非常爱我们的。他给中央写信，要求允许子女探亲；要求让伤残的朴方能离开北京的社会救济院，到江西和他们一起生活；要求能批准毛毛、飞飞到江西上大学……爸爸能够为我们想到的、做到的，他都竭尽全力去做了。

爸爸曾经说过，他自己一生最痛苦的时候当然是“文化大革命”。而我想，“文化大革命”中令他最为痛心的是朴方。爸爸在得知朴方的境遇后，多次给中央写信，要求给朴方治病。朴方到了江西，年近七旬的爸爸，天天为朴方擦身。朴方下半身没有了知觉，爸爸天天给他翻身，给他换衣服；爸爸、妈妈含着眼泪亲手给朴方刷洗屎尿片，洗被单，洗衣裳……每当想到这一幕，我总禁不住热泪长流。

我想，作为父母，他们的痛楚有多么深重！作为父母，他们的意志又是多么坚强！

1970年夏天，我们终于被批准可以去探亲了。多久没有见到爸爸、妈妈和奶奶了！我从宣化坐火车到北京，再到南昌，然后转乘汽车，长途跋涉，日夜兼程。当我第一次走进江西新建县望城岗的那个小院，看见久别了的父母、奶奶，真是又心酸，又高兴！我们总算又回到自己的家了。尽管在小院外面爸爸、妈妈是不自由的，我们的心情是非常压抑的，但在这个院子里，我们感到温暖，我们又有了依靠。不管天南海北，我们都能回到这里，兄弟姐妹们又能和爸爸、妈妈团聚在一起，我们都感到十分快乐！

那时候,爸爸、妈妈工资被停发,只给他们和奶奶一共三个人的基本生活费。爸爸惦记毛毛、飞飞两个插队的小儿女,每个月要从伙食费里抠出钱来,补贴他们的生活,还要给他们准备到江西探亲来往的火车票钱。所以,那时候爸爸、妈妈他们吃饭非常节约。他们自己在院子里开荒,买来菜籽,种上丝瓜、苦瓜、辣椒、大葱、豆角、西红柿……奶奶种菜有经验,担任指导;锄地、浇水等重活都是爸爸承担。奶奶做饭,妈妈烧火;爸爸管发面,有时候还做酒酿;有肉吃的时候常常也是爸爸切肉,他知道哪个部位的肉怎么切、怎么烧最好吃。当饭桌上摆上自己种出的新鲜蔬菜,大家吃起来真是格外香甜。

.....

江西的生活给我们全家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1984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毛写的一篇文章——《在江西的日子里》,深情地记述了爸爸在江西的生活。这是毛毛送给爸爸八十寿辰的生日礼物。爸爸很高兴,亲笔在这张报纸上作了批示,称赞毛毛写得真实。

严酷的现实教育着我们,正视现实,认识社会,认识我们的父亲,也认识自己的责任。我渐渐明白了许多。我们是爸爸、妈妈的儿女,爸爸痛苦,我们痛苦;爸爸受难,我们受难;爸爸高兴,我们都高兴。我们和爸爸生死相依。爸爸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是把自己的命运和我们国家、和我们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爸爸在危难面前,在痛苦面前,那么刚毅,顽强。他不屈服,不动摇,不回头;不哭泣,不抱怨,不诉苦。沉默着,却是高昂着头,承受着一切!我们敬重我们的爸爸!我们和爸爸生死与共!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我们心甘情愿,我们无悔无怨!

林彪的自我爆炸令全党、全中国人民拍手称快！我们家的境遇也从此有了转机。

1973年，我们回到了北京。我们又有了家。

离开北京，我们兄弟姐妹四处离散，父母子女天各一方。历尽磨难，重新相聚，喜悦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当初分手，我们家只有五个子女，三位老人。归来时，我们姐妹已是成双成对，而且还有了孙子辈。我们家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兄弟姐妹相继都有了工作，朴方的身体也得到进一步治疗。我知道，爸爸、妈妈的心里有多么高兴！

1974年，北京的春天已经来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支持下，爸爸回到中央主持工作。三年多谪居江西，归来胸中已是雄兵百万。眼看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千疮百孔，满目疮痍，令人痛心疾首。他下决心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治理国家，与“四人帮”针锋相对，大刀阔斧地全面整顿。整顿铁路，整顿军队，整顿教育，整顿经济；他抓工业，抓农业，抓文化，抓科技……人民看见了希望，国家出现了生机。

1976年是悲壮的一年。我们和全国人民一起经历了大悲大喜、大喜大悲的感情的波澜。

4月5日，全国的人民，北京的民众，为悼念周总理，奋起向“四人帮”公开斗争。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发生了。下午三点，“四人帮”派人带走了我的父亲，两个小时后，又带走了我的母亲。晚上，广场上的高音喇叭说我父亲是整个事件的“总后台”。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爸爸的心，我们全家的心都是和人民在一起的。但是，爸爸早就告诫我们，不许到天安门去，坐汽车都不要经过那里，以防“四人帮”制造事端。我们懂得斗争的复杂，斗争的需要，所以我们一个月前就都不出家门了。

“四人帮”对我爸爸恨之入骨，1975年的整顿更加激怒了他